

青少年受欺负与抑郁的关系

李海垒 张文新 于凤杰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为进一步探讨青少年受欺负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采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 和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初中版) 调查了城市初中生 1485 人(男生 783 人, 女生 702 人)。结果表明: (1) 受言语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言语欺负的被试, 受关系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 (2) 是否受关系欺负与是否受身体欺负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具体来讲, 对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 受身体欺负和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 (3) 受欺负线性模型得到验证, 即随着累积受欺负数量的增多, 抑郁程度会呈现出线性函数的上升趋势。

关键词: 青少年; 受欺负; 受欺负线性模型; 抑郁

1 前言

欺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行为, 涉及的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力或力量的不均衡(因此受害人在保护自己不受欺负方面存在困难), 并且具有重复发生性(Olweus, 1993)。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挪威心理学家 Olweus(1978) 开始研究欺负问题, 欺负问题因此逐渐成为世界上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许多研究已经证实, 欺负行为对受害者有许多负面影响, 会使受欺负青少年面临许多情绪、行为、学业问题(Aluede, Adeleke, Omoike, & Afen-Akpaide, 2008; Ballard, Tucky, & Remley, 1999; Nansel et al., 2001), 甚至包括自残(Barker, Arseneault, Fontaine, & Maughan, 2008)、自杀(Herba et al., 2008) 等。一项关于 20 年的心理健康与欺负问题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与受欺负相关最密切的心理问题就是抑郁($r = 0.45$; Hawker & Boulton, 2000)。但是, 当前大部分研究在考察受欺负的危害时将受欺负经历看作是一个单维结构, 而没有考察受欺负的亚类型(Hawker & Boulton, 2000), 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考察了受欺负的亚类型与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 如 Baldry(2004) 研究发现受间接欺负和受直接欺负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焦虑, Siegel, La Greca 和 Harrison(2009) 研究发现关系欺负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会焦虑, 而外显欺负不能预测。发展情境论指出,

交互作用构成了人类发展的本质过程, 个体与情境之间、个体内部各因素之间、个体所处的情境各因素之间均存在动态交互作用(勒纳, 2002/2011), 各种受欺负亚类型之间可能会存在交互作用。为此, 本研究拟考察受欺负亚类型(受言语欺负、受关系欺负、受身体欺负)(Olweus, 1993;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1999) 与抑郁之间的直接关系, 以及受欺负亚类型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我们预期: 三种受欺负亚类型均与抑郁之间存在正向联系; 三种受欺负亚类型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Rutter(1983) 在人类发展研究中提出了累积危险模型(cumulative risk model), 该模型假设危险因素的累积影响了发展结果, 危险因素越多, 临床问题的发生率就越高。换句话说, 随着危险因素数量的增加, 青少年的精神和生理健康水平及其发展就会下降(Friedman & Chase-Lansdale, 2002)。累积危险(cumulative risk) 是指对于一个人或在一群人中不止一个危险因素同时发生(Sameroff & Rosenblum, 2006)。许多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 表明暴露于多种危险因素之下能够增加被试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相对风险(如 Forehand, Biggar, & Kotchick, 1998; Furstenberg, Cook, Eccles, Elder, & Sameroff, 1999)。这种模型在分析时首先将危险因素根据统计上的临界值(如大于平均数以上的一个标准差、前四分之一等) 或者概念分类(如贫困线

通讯作者: 张文新, E-mail: zhangwenxin@sdu.edu.cn

以下、单亲等) 划分为有或无两类, 然后将被试面对的各种危险因素数量进行加和(Rutter, 1983)。

在关于累积危险模型的研究中, 存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是 Rutter(1983) 认为的阈限模型(二次函数模型) (threshold model 或者 quadratic model) , 另一种是 Sameroff, Bartko, Baldwin, Baldwin 和 Seifer(1998) 提出的线性模型(linear model) 。阈限模型认为, 在经历特定数量的危险因素之后, 问题行为结果会以二次函数的方式有显著的增加。许多研究支持了阈限模型, Biederman 及其同事(1995) 考察了家庭环境的危险因素跟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ADHD) 的关系, 结果表明与没有危险因素的儿童相比, 具有两个危险因素的儿童患 ADHD 的概率会增加 9.5 倍, 具有三个危险因素的儿童患 ADHD 的概率会增加 34.6 倍; Greenberg, Speltz, DeKlyen 和 Jones(2001) 发现超过三个危险因素之后, 对临床症状的预测力会有急剧的上升; Jones, Forehand, Brody 和 Armistead(2002) 指出三和四个危险因素之间是适应问题增加的触发点(trigger point) 。也有一些研究支持线性模型, 如 Sameroff 等(1998) 研究发现随着危险因素数量的上升, 不良结果表现出基本稳定的上升趋势; Appleyard, Egeland, van Dulmen 和 Sroufe(2005) 研究发现危险因素数量与内外化问题之间的关系呈线性上升趋势。有学者指出, 考察这两种模型非常重要(Jones et al., 2002) , 因为这对确定干预对象和制定干预方案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中, 根据前述两种理论提出两种竞争性的累积受欺负危险模型, 一种是受欺负阈限模型, 即随着累积受欺负数量的增多, 抑郁程度会呈现出二次方程的上升趋势, 另一种是受欺负线性模型, 即随着累积受欺负数量的增多, 抑郁程度会呈现出线性方程的上升趋势。本研究根据 Rutter(1983) 的计算方法得出每个被试的受欺负危险因素数量, 然后对受欺负的两种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考察哪种模型能够更好与数据拟合。根据 Appleyard 等(2005) 对于内外化问题的研究, 我们预期受欺负线性模型会得到数据的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拟探讨受言语欺负、受关系欺负、受身体欺负三种受欺负亚类型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以及受欺负数量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模式。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

五所城市初中抽取初一至初三的初中生 1524 人进行问卷调查, 获得有效被试 1485 人, 有效率为 97.44%, 其中男生 783 人(52.73%), 女生 702 人(47.27%), 平均年龄 14.56 ± 1.23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该量表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 Radloff (1977) 编制, 主要用于评价当前(一周内) 的抑郁症状, 着重考察抑郁情感或心境, 常用于不同时间断面调查结果的比较, 也广泛用于流行病学调查, 初步筛查出具有抑郁症状的对象, 以便进一步确诊。量表共 20 个题目, 其中四个题目为反向记分题, 要求被试回答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题目反映了抑郁状态的六个侧面: 抑郁心情、罪恶感和无价值感、无助与绝望感、精神运动性迟滞、食欲丧失、睡眠障碍。采用四点计分, 0 代表偶尔或无(少于一天) , 1 代表有时(1~2 天) , 2 代表经常(3~4 天) , 3 代表多数时间(5~7 天) 。具体题目如“一些通常并不困扰我的事使我心烦”; “我觉得别人厌恶我”; “我感到孤独”; “我走路很慢”; “我不想吃东西, 胃口不好”; “我睡觉不解乏”等。该量表的总分 ≥ 20 表示肯定有抑郁症状,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 在 0.90 以上, 间隔四周的重测信度为 0.67; 效度方面, 与自评抑郁量表(SDS) 的相关为 0.90(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 是 0.88。

2.2.2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

该量表分为小学版和初中版, 具有很好的心理测量学属性(Pellegrini, Bartini, & Brooks, 1999) , 与同伴提名法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Ross, 1996) , 是测量中学阶段欺负问题的最好工具之一(Austin & Joseph, 1996) 。本研究采用张文新等(1999) 修订的初中版问卷里测量受欺负类型的六个题目。这六个题目分别是: (1) “别人给我起难听的外号, 骂我, 或者取笑和讽刺我”; (2) “其他同学故意不让我参加某些活动, 把我排斥在他们的朋友之外, 或者让他(们) 的朋友完全不理睬我”; (3) “某些同学打、踢、推、撞或者威胁我”; (4) “某些同学散布关于我的一些谣言, 并试图使其他人不喜欢我”; (5) “别人强迫向我要钱, 或者拿走或损坏我的东西”; (6) “某些同学因为我说话口音和他们不同而给我起难听的外号”。采用五点计分, 0 表示本学期没有发生过, 1

表示只发生过一两次, 2 表示一个月两三次, 3 表示大约一周一次, 4 表示一周好几次。第一题和第六题用来测量言语欺负, 第二题和第四题用来测量关系欺负, 第三题和第五题用来测量身体欺负。只要被试在一个题目上的得分大于或等于 2 (一个月两三次), 就被划分为受欺负者。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是 0.82, 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 0.78 (张文新等, 199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是 0.72。

2.3 施测程序与统计分析

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主试均为发展心理学研究生, 测试时间 15 分钟左右。在考察受言语欺负、受关系欺负、受身体欺负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时, 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的统计方法; 在对受欺负阈限模型和受欺负线性模型进行检验时, 采用趋势分析的统计方法。统计软件采用 SPSS13.0。

3 结果

3.1 受言语欺负、受关系欺负、受身体欺负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对于青少年来说, 如果第一题“别人给我起难听的外号, 骂我, 或者取笑和讽刺我”或第六题“某些同学因为我说话口音和他们不同而给我起难听的外号”的得分大于或等于 2, 则该被试受言语欺负; 如果第二题“其他同学故意不让我参加某些活动, 把我排斥在他们的朋友之外, 或者让他(们)的朋友完全不理睬我”或第四题“某些同学散布关于我的一些谣言, 并试图使其他人不喜欢我”的得分大于或等于 2, 则该被试受关系欺负; 如果第三题“某些同学打、踢、推、撞或者威胁我”或第五题“别人强迫我要钱, 或者拿走或损坏我的东西”的得分大于或等于 2, 则该被试受身体欺负。各组的基本描述统计信息见表 1。

表 1 是否受言语欺负、是否受关系欺负、是否受身体欺负被试的抑郁得分及人数

	受言语欺负		受关系欺负		受身体欺负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i>M</i>	16.39	12.46	18.94	12.76	18.82	13.10
<i>SD</i>	10.86	9.37	11.41	9.47	11.73	9.65
<i>n</i>	440	1045	207	1278	136	1349

以抑郁为因变量, 以是否受言语欺负、是否受关系欺负、是否受身体欺负为自变量进行 2(是、否) × 2(是、否) × 2(是、否) 三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结果发现: 是否受言语欺负的主效应显著, $F_{(1, 1477)} = 5.71, p < 0.05$, 受言语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言语欺负者; 是否受关系欺负的主效应显著, $F_{(1, 1477)} = 28.19, p < 0.001$, 受关系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关系欺负者; 是否受身体欺负的主效应显著, $F_{(1, 1477)} = 9.52, p < 0.01$,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者; 是否受关系欺负与是否受身体欺负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F_{(1, 1477)} = 7.08, p < 0.01$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对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 受身体欺负和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 ($t = 3.95, p < 0.001$)。交互效应的具体特点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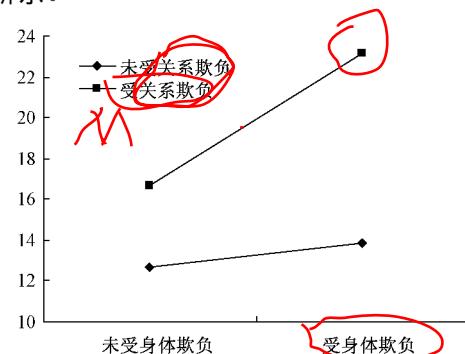


图 1 是否受身体欺负与是否受关系欺负之间的交互作用

3.2 受欺负阈限模型和受欺负线性模型的检验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趋势分析方法对两个模型进行检验。根据 Rutter (1983) 的编码方法, 首先对每个被试在测查受欺负类型的六个题目上进行 0 和 1 编码, 方法是, 若一个题目得分大于或等于 2, 则编码为 1, 表示面临这个具体欺负事件的危险, 若小于 2, 则编码为 0, 表示这种具体欺负事件的危险不存在, 其它五个题目均采用此程序进行编码; 然后将被试在六个题目上的编码分数求和, 所得总分即为被试的累积受欺负得分, 分数区间从 0 到 6, 由于得分是 4、5、6 的人数分别是 23 人、13 人和 6 人, 样本量均小于 30, 参考 Appleyard 等 (2005)、Trentacosta 等 (2008) 的做法将其合并为一组, 共分成五个组, 各组的抑郁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及人数情况如表 2。

通过描述统计发现抑郁得分的数据呈正偏态分布, 因此对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然后进行统计分析。趋势分析的结果如表 3。

表 2 不同累积受欺负得分各组的抑郁得分
平均数、标准差及人数情况

累积受欺负得分	0	1	2	3	≥4
<i>M</i>	12.20	14.22	16.13	21.17	24.67
<i>SD</i>	9.29	9.53	10.72	12.68	10.13
<i>n</i>	956	308	127	52	42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加权还是未加权,线性交互项均达到了 0.001 显著水平,而二次交互项不显著,这说明抑郁与累积受欺负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表 3 抑郁得分在不同累积受欺负得分组上的趋势分析结果

		<i>SS</i>	<i>df</i>	<i>MS</i>	<i>F</i>	<i>p</i>
<i>F</i>		53.387	4	13.347	20.651	<0.001
线性交互项	未加权	38.685	1	38.685	59.858	<0.001
	加权	51.505	1	51.505	79.693	<0.001
二次交互项	未加权	1.021	1	1.021	1.580	>0.05
	加权	1.085	1	1.085	1.679	>0.05

4 讨论

研究发现,受言语欺负、受关系欺负、受身体欺负均能显著增加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这与 Baldry (2004) 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各种受欺负经历均会造成青少年表现出更多抑郁症状。另外,本研究发现受关系欺负和受身体欺负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为受欺负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传统的受欺负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受欺负与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对受欺负本身的研究,如果对不同受欺负类型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话,这对于更好理解受欺负与适应不良之间的关系以及欺负干预工作都有积极的作用。

进一步分析交互作用发现,对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受身体欺负和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该结果似乎表明,受关系欺负是受身体欺负与抑郁之间关系的触发因素(triggering factor),即如果青少年未受到关系欺负,那么不管其受不受身体欺负,都不会对其抑郁症状产生影响,而如果青少年受到关系欺负,那么受身体欺负就会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正向作用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同伴关系的影响有关。对于青少年来讲,同伴关系是其重要的社会支持源(张文新,2002)。对于受关系欺负的青少年来讲,其同伴

关系的数量往往较少,质量也较差,这就使得这些青少年在受到身体欺负时既不能获得及时的保护,也不能在受身体欺负后获得情感的支持,从而与未受身体欺负的青少年相比,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水平;而对于未受关系欺负的青少年来讲,其同伴关系可能较好,至少不会太差,这就使得他们容易获得保护和情感支持,所以即使其受到身体欺负,也会因为朋友的及时制止,或者情感上的支持而较少出现抑郁症状,因此,受身体欺负对其抑郁症状的影响不明显。

本研究结果表明,受欺负线性模型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这说明受欺负的危害会随着受欺负数量的增加而呈线性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与 Sameroff 等(1998)和 Appleyard 等(2005)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 Biederman 等(1995)、Greenberg 等(2001)和 Jones 等(2002)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出现这种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研究考察的危险因素不一样,测量的不良结果指标不一样,或者采用的统计方法有差别。因此,试图建立跨领域的普适性的累积危险模型似乎非常困难,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根据研究领域的特异性,建立该领域的累积危险模型,并通过多种统计方法和不良结果指标进一步去验证该模型。本研究中,通过趋势分析验证了受欺负线性模型,如果不良结果指标发生变化,如测量焦虑、学业失败等,是否仍然支持受欺负线性模型呢?这是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果将来的许多研究仍然支持受欺负线性模型,那么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认为,在受欺负研究领域,受欺负与不良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呈线性趋势的。确定受欺负与不良结果之间的关系是阈限模式还是线性模式对于干预方案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这对制定合理的干预方案有很大帮助。

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在两个方面推进了受欺负的研究工作。首先,本研究在将受欺负分为三种亚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发现了受关系欺负和受身体欺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这启示研究者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考察受欺负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各种受欺负亚类型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影响。其次,本研究提出了受欺负线性模型并验证了受欺负数量与抑郁之间的线性关系,这对于将来进一步考察受欺负与其他适应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定合理的干预方案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本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本研究也存在

一些局限: 首先, 从样本上考虑, 本研究未考察农村青少年, 在进行结果推论时要慎重; 其次, 本研究是横断研究, 因此在因果推论上存在一定困难, 如果能够进行追踪研究设计, 那么对变量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 而且对各变量的时间稳定性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也会有更恰当的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 有必要考察农村青少年, 另外, 可以进行两个或多个时间点的追踪研究。

5 结论

(1) 受言语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言语欺负的被试; 受关系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抑郁得分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

(2) 是否受关系欺负与是否受身体欺负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具体来讲, 对于未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 受身体欺负和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受关系欺负的被试组来讲, 受身体欺负的被试在抑郁得分上显著高于未受身体欺负的被试。

(3) 受欺负线性模型得到验证, 即随着累积受欺负数量的增多, 抑郁程度会呈现出线性函数的上升趋势。

参考文献:

- Aluede, O., Adeleke, F., Omoike, D., & Afen-Akpaide, J. (2008). A review of the extent,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bullying behaviour in schools. *Journal of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35(2), 151-158.
- Appleyard, K., Egeland, B., van Dulmen, M. H. M., & Sroufe, L. A. (2005). When more is not better: The role of cumulative risk in child behavior outcom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6(3), 235-245.
- Austin, S., & Joseph, S. (1996). Assessment of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8 to 11 year-old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6(4), 447-456.
- Baldry, A. C. (2004). The impac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bullying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Italian youngsters. *Aggressive Behavior*, 30(5), 343-355.
- Ballard, M., Tucky, A., & Remley, T. P. Jr. (1999). Bullying and violence: A proposed prevention program. *NASSP Bulletin*, 38-47.
- Barker, E. D., Arseneault, L., Fontaine, N., & Maughan, B. (2008).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ce: Relationships to delinquency and self-har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7(9), 1030-1038.
- Biederman, J., Milberger, S., Faraone, S. V., Kiely, K., Guite, J.,

- Mick, E., et al. (1995). Family-environment risk factors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test of Rutter's indicators of advers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2(6), 464-470.
- Forehand, R., Biggar, H., & Kotchick, B. A. (1998). Cumulative risk across family stressors: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for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6(2), 119-128.
- Friedman, R. J., & Chase-Lansdale, P. L. (2002). Chronic adversities. In M. Rutter & E. Taylor (Ed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th ed., pp. 261-276). Oxford, UK: Blackwell Science.
- Furstenberg, F. F., Jr., Cook, T., Eccles, J., Elder, G. H., & Sameroff, A. J. (1999). *Urban families and academic suc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berg, M. T., Speltz, M. L., DeKlyen, M., & Jones, K. (2001). Correlates of clinic referral for early conduct problems: Variable- and 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3(2), 255-276.
- Hawker, D. S. J., & Boulton, M. J. (2000). Twenty years' research on peer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1(4), 441-455.
- Herba, C. M., Ferdinand, R. F., Stijnen, T., Veenstra, R., Oldehinkel, A. J., Ormel, J., et al. (2008).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the TRAILS study: Specific vulnerabilities of victim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49(8), 867-876.
- Jones, D. J., Forehand, R., Brody, G., & Armistead, L. (2002).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of African-American children in single-mother families: A test of three risk model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1), 105-115.
- Nansel, T. R., Oveipeck, M., Pilla, R. S., Ruan, W. J., Simons-Morton, B., & Scheidt, P. (2001). Bullying behaviou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5(16), 2094-2100.
- Olweus, D. (1978). *Aggression in the schools: Bullying and whipping boys*.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 Olweus, D. (1993).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Blackwell.
- Pellegrini, A. D., Bartini, M., & Brooks, F. (1999). School bullies, victims, and aggressive victims: Factors relating to group affiliation and victimizat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1(2), 216-224.
- Radloff, L. S. (1977).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3), 385-401.
- Ross, D. M. (1996). *Childhood bullying and teasing: What school personnel, other professionals, and parents can do*.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Rutter, M. (1983). Statistical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s: Facets and perspectives. In D. Magnusson & V. Allen (Eds.), *Human development: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pp. 295-319).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 Sameroff, A. J. , Bartko, W. T. , Baldwin, A. , Baldwin, C. , & Seifer, R. (1998). Family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 competence. In M. Lewis & C. Feiring (Eds.) , *Families, risk, and competence* (pp. 161 – 183). Mahwah, NJ: Erlbaum.
- Sameroff, A. , & Rosenblum, K. (2006). Psychosocial constra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In B. Lester, A. Masten, & B. McEwen (Eds.) ,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 1094 , 116 – 124.
- Siegel, R. S. , La Greca, A. M. , & Harrison, H. M. (2009). Peer victimiz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in adolescents: Prospective and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 38(8) , 1096 – 1109.
- Trentacosta, C. J. , Hyde, L. W. , Shaw, D. S. , Dishion, T. J. , Gardner, F. , & Wilson, M. (2008). The relations among cumulative risk, parenting, and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early childhood.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 49(11) , 1211 – 1219.
- 勒纳, R. M. (2011). 人类发展的概念与理论(张文新主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27 – 252.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主编).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200 – 241.
- 张文新. (主编). (2002). 青少年发展心理学.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64 – 203.
- 张文新, 武建芬, Jones, K. (1999).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心理发展与教育* , 15(2) , 7 –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of Adolescents

LI Hai-lei ZHANG Wen-xin YU Feng-jie

(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1485 adolescents from urban junior high schools (boys, 783; girls, 702) completed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and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during school hour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peer victimization to depres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any form of verbal, relational or physical victimization from peer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depression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experience; (2)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dolescent status of being relationally victimized and status of being physically victimized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uch that those also experiencing physical victimization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depression than adolescents without such experience. However, among adolescents not experiencing relational victimization such a difference in depression did not exist between adolescents who reported being physically victimized and those did not; (3) With the increase of events of victimization, the level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increased by linear trends.

Key words: adolescents; victimization; linear model of victimization; depression